

黑牢進出 (三)

延安縣長歷險記

●高仲謙 (曾任延安、洛川、米脂等縣長、大學教授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)

放人祇是說聲誤會

我在米脂被扣押時，王震派了位名叫張仲翰的共軍團長，要將我押回綏德的王震旅部 (當時王震轄有六團人馬，號稱旅長)，趁著經過米脂街頭的機會，我寫了張紙條，趁押解我的共軍不注意時，交給了相熟的鄉人，請他們轉交給米脂縣長蕭履恭，請蕭縣長想辦法與毛澤東連絡，跟毛澤東解釋清楚我只是去看包專員，順便送內人回娘家，絕無棄職潛逃打算。

事後證明，我的這張紙條與內人的奔走相互配合，發揮了最大力量。

我被押往綏德時，一路上受盡階下囚的屈辱，到了王震總部立刻被打入「軍法處」的黑牢，四周刑具森然，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「作」了的樣子。

王震「旅部政委」袁任遠來看我時，陰森森的好似我已「階下死囚」，袁的趾高氣昂狀令人氣炸。

當晚毛澤東接到內人的申冤及蕭縣長為我代轉的「解釋」後，或許是毛澤東認為那時還不適

宜與國民政府翻臉，也或許是我在延安那幾年「和而不同」的作法，使他覺得還有點「交情」存在。因而，毛澤東下了個指令給王震，說這一切全是「誤會」。

毛澤東聲明「誤會」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，第二天王震的態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他前倨後恭的先放我出來，客客氣氣的對我說這一切全是「誤會」，滿臉含笑的样子，好像與我是多年老友。

這正是共黨的狡猾真面目，他抓人時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放人時也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抓了人再放人時，也不會說什麼道歉，簡單一聲「誤會」就了事。

共黨個個都是千面人，今天對你說笑拍肩，明天或許就會戳你一刀，讓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從王震的黑獄中出來後，我並沒有就此放棄自己的職責，仍然回到延安，毛澤東他們這些共黨見到我好似不知道有這回事似的，我也就不與理會，自己作自己的事，繼續執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務。

保住一片純淨天空

我能够由王震的黑獄中逃生，倒不是中共他們對我高某人個人有什麼特別的喜好，而是因為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殺害政府官員，共黨們深知得罪中央後的嚴重後果，因此在看我始終不屈服而中央又極關切這事後，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。

我對中共反反覆覆的作法，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對我「誘降」，對中共而言，政府派任的縣長倒向中共，是個最好的統戰宣傳話題。

任憑中共再翻雲覆雨，我總是不動如山而絕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誘，為政府在延安保留住一片純淨不受赤禍污染的天空。

在我們縣政府以外，中共所盤據的地區，那可就是藏污納垢、黑暗的不得了，尤其愈是高級的共黨，他們的生活最是靡爛。

像毛澤東在延安艱困的情況下，他還是要「四菜一湯」，出來與我談話，還是要六名女秘書相陪，那是令其他非淪陷區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。

毛澤東對外把延安宣傳得太美、太好了，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「生產努力、豐衣足食、政治民主、平等自由」的「革命聖地」，以這種「美麗的謊言」，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跑到延安吃苦。

共僮們最令人不齒的是瞪著眼睛說瞎話，明明純潔青年到延安去受到「衣分三色、食分五等」的不公平歧視及虐待，共僮們却仍厚著臉皮說青年們受到良好對待，他們一次又一次將謊言重複宣傳，造成列寧所說：「謊言說一千次就成真理」的效果。

共僮們瞪著眼睛說瞎話的實例是太多太多，舉不勝舉，民國廿八年五月，毛澤東在延安羣衆五四運動廿週年紀念會上撒謊說：

「你們看，在統一方面，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，是統一的。延安的知識青年、學生青年、工人青年、農民青年，大家都是團結的。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，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。今天到會的人，大多數來自千里之外，不論姓張、姓李、是男、是女，做工務農，大家都是一條心，這還不算全國模範嗎？」

毛澤東將延安自封爲「反抗日本根據地、三民主義模範區」，當時在延安各處都可聽到這些口號標語，事實上，不信仰三民主義，是路人皆知的事，毛澤東却一次又一次散布謊言，企圖將謊言變成真理。

毛澤東隨時隨地利用機會大作虛偽宣傳。一次，共僮們請吃晚飯，中共「邊區參議員」的大

頭目們全到齊了，黑壓壓的坐了好多桌的廳長、師長，我與毛澤東一起坐在首席。

宴席開始，毛澤東站起來講話，大家鼓掌恭聽如儀。毛澤東一說完，居然向我一指：「請高同志來說幾句話！」我沒有準備要講話，但是毛澤東既然點名要我講話，我祇好站起來講。

當時是政府容共「蜜月」期間，中共是一付恭順的樣子，我身負調和對立與衝突的責任，只好應酬性的對中共稍稍讚美了一下。

沒想到，第二天中共的機關報「延安新中華報」（乃小型報，三天出一次，民國廿九年夏天改爲解放日報），將我在酒宴上的講話刊出，加上「高縣長代表中央大爲稱讚中共」的標題。

我竟被毛澤東利用了，當下我與在中共編報單位服務的同仁連絡，方知道當晚正進行晚宴時，毛澤東已經悄悄的派人將我的講話記錄下來送到報社了。

由此可知，毛澤東多會利用機會宣傳，我們稍一不慎，就被他們利用爲宣傳的工具。

幽靈頂被排隊領煤

毛澤東不但利用我不經意的一段話作宣傳，還將一些本來是負面的事物，宣傳得煞有其事好似共產黨「很好」的樣子。

中共宣傳「在延安，犯罪的人都不會跑，他們願意在延安爲『革命』而努力。」不知道的人，以爲中共眞作到了周文王「割地爲牢」的禮義之邦境界。

但是住過延安的人都知道，並不是延安的犯

人不想跑，而是他們根本跑不了，因爲中共規定犯人穿的褲子兩條褲管顏色不一樣，一邊是藍色、一邊是紅色。

如此一來，身穿紅、藍兩色褲管的犯人，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監視的特殊階層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怎麼能跑？

另一中共宣傳騙人的實例：中共對外誇稱他們對青年學生非常好，藉此來吸引外地學生奔向延安。

實際上，在延安有世界罕見的青年學生的「排隊奇觀」。

住過延安的人，在冬天起來早，就可以看見這種「奇觀」。

延安冬季每天天沒亮，就有一大批青年學生排著隊，這些青年學生們每人不是穿大衣、穿棉襖，而是將棉襖披披在身上，默默的排隊著。

延安的冬天很冷，屋內一定要燒煤才暖和，中共却每天定量的配給學生們很少一點點煤，學生們如果想燒煤取暖，就得每天排隊，由中共幹部帶著到三四十里外去取煤，排在後頭的有時還沒有煤可領。

因此大家都起個大早去排隊，排隊，天冷，每人穿的衣服不够暖和，大家只有將棉襖披在身上當作大衣穿。

在陰暗的雪地中，一隊隊如幽靈般披著被子去取煤的行列，這是多麼陰森、恐怖、絕望的景象。

然而，在中共的宣傳下，延安却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種「全國模範」的假象，許多熱血的青年

不明真象就這麼被中共的謊言欺騙而墜入共黨地獄之中。

爲了使青年們得知共黨醜惡真象，我曾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壁報，揭發共黨真面目。

我利用縣政府餘裕的人力製作一些重要的壁報給大家看。出一份「今日中國」的油印週刊。我們在壁報中大量引用政府與中央的話，儘量不自己寫文章批評中共。

中共當時正高唱與中央「合作」的時候，對我們引用中央的話，不但無法責怪，表面上還不得不贊成。

我在選錄中央及政府的資料時，特別將有關抗戰真象、時事實情的資料大量引用，使青年們看了就可以對照中共的話，而知中共所說完全是謊言，對喚醒青年，有極大的助益。

壁報在延安重要街頭貼出後，立刻引起了一陣轟動，許多青年及延安民衆皆蜂擁來觀看我們的壁報，看後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說道：「真有其事嗎？」

中共不願他們假面被揭穿，就派出「抗日大學」學生，製作一些壁報來和我們打對臺。但是效果與受歡迎的程度，始終比我們差上許多。

由於我們只用中央與政府的資料，中共雖對壁報嫉恨，却不好採取暴力手段來禁止，使我們在黑暗、污穢的延安，保持了一些光明、正義的呼聲。

江青勾搭上毛澤東

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對「大學」的憧憬在延

安創辦了「抗日大學」。「抗大」根本沒有任何大學所具備的條件，沒有完整的師資、充實的設備、必要的課程……不要說是大學，就是一所「學校」也都不像，因為它教的不是一般學校中的課程，而以教共黨「革命」爲主，這算是「學校」嗎？

因爲掛了一個「大學」的名字，中共又採取「照單全收」的方式，不管來的人阿貓阿狗，程度如何，都能進入「讀書」，不少人被「可以進大學讀書」的幻想給引誘進了延安。

江青就是在這個情況下進入「抗日大學」讀書，認識毛澤東的。

江青出身極爲低賤，在上海當三流電影演員時曾和不少男人有曖昧關係，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藝名「藍蘋」爲諧音，叫她爲「爛蘋果」，聲名狼藉，她在上海與唐納鬧的婚變更是人們茶餘酒後的笑柄。

江青到延安後，還是不改其風流習性，先與徐以新談愛，愛的死去活來。

爲何毛澤東又會勾上了江青呢？有人認爲是毛澤東「胃口大」「喜歡漂亮女人」，才主動的把江青納入後宮。

這點並不正確，當時延安一帶雖然男女間的比例是十八比一，再醜的女子在延安都會成爲衆多男人追求的對象。

但是這種情形却用不到毛澤東身上，因爲毛澤東權大勢大，他要那個女人，那個女人敢不奉上？由毛澤東每次與我見面都會有六個「女秘書」隨侍，我們就可知道，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

對毛澤東毫無影響。

江青不漂亮，只是中人之姿，不過她狐媚的淫蕩個性，是其他女人難與比擬的。

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憑外表就令「閱人多矣」的毛澤東看上，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，江青絕不是如一般人所傳言的被毛澤東主動看上而強娶過去。就我所知是江青想盡辦法勾引毛澤東成姦，在毛江兩人的關係中，江青絕對是佔主動的一方。

當時，江青雖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談戀愛談的死去活來，實蒙延安「男女比例十八比一」的特殊情況之賜，受到衆多男性高幹的青睞。但頗有小聰明的江青却也知道，這種風光絕非長遠之計，因爲露水鴛鴦是最沒有保障的，野心更大的她不甘作男人玩物，而更想能掌握實際權力。想要達到這個目的，以江青的「爛蘋果」名聲，她是今生休想的。

因此，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個在共黨陣營中有權又有勢的共酋，來作爲她一生的依靠，以備她「一人得道、雞犬升天」的跟著這個毛酋的得勢而滿足其政治野心。

江青看上的目標就是毛澤東。

毛澤東當時倒不是沒有太太，他的前妻楊開慧在民國十九年死於長沙，後來毛澤東在井岡山又和賀子貞結婚。

賀子貞對毛而言，可說是個「好太太」，她不但替毛生兒育女，而且陪侍毛澤東完成了所謂二萬五千里的「長征」，在毛澤東最危急的狀況下，都不曾拋棄毛澤東過。

然而當毛澤東在延安作山大王時，賀子貞却不在身邊，因為在「長征」時，她負傷流血過多，精神受到很大刺激，毛澤東把她送到莫斯科去醫病了。

賀子貞被送到莫斯科，這就為江青製造了「最佳機會」，於是江青開始打定主意要「倒追」毛澤東。

要「追」毛澤東；第一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，對於這一點，江青本來就是搔首弄姿、招蜂引蝶的能手。

剛好，那時毛澤東為了拉攏青年人，每星期都到「抗日大學」去演講，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澤東注意力的最佳機會。

於是每當毛澤東去演講時，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只要一有機會，她就立刻舉手向毛澤東發問，使毛澤東自然而然的對她有了一「強烈印象」。

最後一次，毛澤東不在學校中回答江青的問題，改口說：「妳這個問題很好，我回去想一想再給妳答覆。」

當晚，毛澤東就藉口「回答問題」，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間，兩人這下乾柴烈火立刻上了床，成全好事。

毛澤東派康生將江青調到「中央軍委會」工作，以便他倆近水樓台方便幽會。

以毛澤東的個性，最初也不過是想玩一玩江青罷了，那會真的想娶江青當老婆？

但是江青畢竟有辦法，她和毛澤東在一起沒多久，就讓毛澤東感到「離不開她」，竟然宣佈

要與江青「結婚」。

以毒攻毒遏止滲透

毛澤東、江青結婚這件事，在當時的延安是件大事，只不過是件「醜聞」大事，不但我們政府人員都笑毛澤東喜歡穿「破鞋」，就是共產黨員也莫不個個以「毛江聯婚」為恥。

因為毛澤東還有妻子賀子貞在莫斯科，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「爛蘋果」，但毛澤東竟然硬要以有婦之夫的身分來娶江青，這不叫中共黨員感到丟人現眼？

因此，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頭目，只有康生、柯慶施等幾名毛澤東的心腹贊成，其他可說幾乎全體堅決的反对。

最後在毛澤東保證「不讓江青參與政治」的情況下，中共頭目們才算勉強允許江青「照顧」毛澤東，以取代精神有問題的賀子貞。

事後證明，江青是絕不甘於雌伏而不接觸政治的，她勾搭上毛澤東，目的本來就是想滿足她的政治野心，孰料却被中共偽中央的此一決議，給壓得完全抬不起頭來，她心頭的恥辱感及怨恨心之強烈可想而知。

後來文革開始，江青手握大權，跋扈不可一世時，搞出殺人數千萬、腥風血雨的「文革」慘劇，很多當時反對她與毛澤東結婚的中共老幹部，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來，相信他們必然後悔當初為何不反對到底吧！

毛澤東與江青勾搭，在延安城內只是場鬧劇，在江青被限制「不准參與政治」而後兩人結合

，也就漸漸沒人理會了。但延安城內還是波濤洶湧，許許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衝擊激盪著。

還記得有一樁直接與共會過招的事，那時是民國二十八年，毛澤東發表「論新階級」又再鼓吹強調所謂的「統一戰線」。

當時毛澤東為了要搞統戰，叫出了一個「組織民族聯盟，請蔣委員長當民盟領袖」的口號，其用意當然是想作分化離間的工作，政府也沒上他的當，隨他叫罵、喊鬧。

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」的「辦法」，他們希望能允許共產黨以「提名單」的方式來加入國民黨。

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的目的，是想再像以往共產黨滲入國民黨的「容共」時期一樣，藉著共產黨人員的滲入國民黨，來把持、分化、破壞國民黨。

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會口中得知毛澤東有此計劃，建議於政府人員，當我得知毛澤東有此意圖時，心想：

「那還得了，如果讓共產黨人員集體大批的以『提名單』方式加入國民黨，國民黨漫無限制的容許共產黨黨員進入，那不天下大亂才怪。」因此，我想到底應如何來阻止中共這種惡毒的統戰企圖呢？

當時，恰好國民黨有一些同志正讀於抗日大學，被中共們視為「異端」，各種校內的團體都不允許我們這些學生參與。

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主意，我跑去找一個職位相當高的共會王明，向他建議：

「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讓共產黨黨員以『提名單』的方式加入國民黨之建議，這個建議很好呀！現在我們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做起，譬如我們先讓『抗大』的一些非共產黨黨員同學以『提名單』方式加入『抗大』的活動如何？」

我是全以一種輕鬆聊天的方式，在談話中不經意的提出了這個問題，孰料却把這個平日能言善道的共會給唬住了，他一下子吶吶的講不出話來。

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覆，當下很輕鬆的告訴他：「沒關係，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問題，過兩天協調好了再告訴我也可以。」

我早知道中共絕對不敢接納我方同學參加其校方的活動組織，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這種強烈排他性的本性，來將中共一軍，讓中共知道，他們連區區一個學校組織都如此嚴密的不讓非黨員的同學參加，他們又有何理由要求國民黨開放給共產黨參加？

過兩天，這名高級共會跑來看我了，他一看我就埋怨的對著我說：

「高縣長！你的建議真害人，我把你的建議向上面提出了之後，被毛主席訓斥了一頓，罵我說這種事是『雙方面』的事，我們還不配管呢！我看以後就別提這種事了吧！」

因此，共會們在我面前也就不敢再提有關「提名單」入黨的事了，中共的又一樁統戰陰謀就此煙消雲散。

類似這種與共會互相過招，互鬥心機的情形，幾乎每天都發生，在延安，我當縣長是父母

官，而中共他們進駐延安，又是實質的佔領者，雙方的關係實在極為微妙，我就盡量在這微妙的情勢下來為政府作工作。

刀口打滾日益危險

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民國二十九年，那時，由於日寇侵華日亟，造成政府很大的壓力，因而政府決定集中一切力量來抗日，對延安的縣政業務認為已經到了一個暫作結束的階段，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將延安縣政府作一結束。

中共從民國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，四年多的時間，國民政府始終還是在延安保有縣政府，派駐縣長統治延安庶務，使共會們雖然氣焰囂張，却還得尊敬中央派來的延安縣長，完全不敢講「攆」我們走的話。

二十九年我們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，中共爲了要歡送我們，特地開了歡送會，請我們及縣政府人員及保安隊吃飯。

表面上看起來中共與我們頗有「離情依依」的樣子，其實中共才巴不得我們走呢，我們就好像他們的眼中釘、肉中刺一般，他們是拔之為快，我們自動要走，他們當然是要歡天喜地、敲鑼打鼓的慶祝一番。

那時我們的保安隊還有四十幾人，對勢力已逐漸形膨大的中共而言，實在不算甚麼，然而就連這麼區區四十幾支人槍，中共還是又嫉又怕的不願讓我們擁有。

中共宴請我們的保安隊時，席上每人發了一些錢，大家以為中共要犒賞大家，沒料到這是中

共的另一陰謀。

延安縣政府的保安隊大多請的是當地民衆來擔任，這是因為當時的局勢實在太過險惡了，人人都知道在淪陷區與中共打交道，就像是撿著頭辦事一般，隨時會遭殺身之禍，因此，政府自安全地帶派來的辦事人員，大多是作幾個月又調回後方，很少能長久待下來的，尤其是保安隊更是難找後方的人擔任。

保安隊的當地人大多思想單純，對中共的陰險狡詐並不清楚，看到中共發錢給大家又請吃飯，當然是樂得不得了。

誰知道，就在吃飯的宴席上，招待的共幹却藉口我們保安隊員出言無狀得罪了他，當下立刻臉一沉，前一秒鐘他還在跟那些保安隊員們拍肩搭背的叫「同志；多喝兩杯！」下一秒鐘立刻一抹臉，臉上的笑容全沒了，只見共幹大叫一聲：「全給我拿下來！」

在飯廳外等著逮人的共幹們當下一湧而入，個個似兇神惡煞一般，就把這些單純的保安隊員們全給繳械扣了起來。

所有保安隊員全被這種突然的變故給嚇呆了，大家想不出，爲甚麼剛剛還和藹可親的共幹，一轉身就變成了催命閻王般可怖？

當時縣政府並非一起同時撤退，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，保安隊是最後幾批人之一，他們被繳械而掃地出門時，我還在榆林專員公署內接受最後指示，再趕回延安，作最後的處理。

當我回延安時，延安縣政府已經完全撤離，只剩下我及幾個親近的朋友，那時，我們在延安

真是如孤身入虎穴，是否能再出來都不得而知。我並不害怕，因為從奉派到延安當縣長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抱定隨時為國家犧牲、成仁的決心。

最後在延安也沒有甚麼事好辦，縣政府內的一切，中共根本不感興趣，我們也不需要移交些甚麼東西給中共，我最後走的任務，只是負責再與那些共僑們「握手告別」，同時藉告別的機會，將中央劃撥延安歸中共管轄的德意與衷誠，再一一面告這些共僑，希望共僑們能體察政府謀求國家團結和諧的苦心，不要再「明裡擁護、暗地破壞」了。

從毛澤東最後設宴歡送我時，絕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曖昧態度中，我已隱隱的感覺到，陝北今後將更為多事了。

事實發展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，中共並未因中央將陝北區完全劃交中共邊區政府管轄為滿足，一等抗戰勝利後，就立刻以陝北為根據地，展開了全面的武裝叛變行動，最後整個中國大陸因而淪陷。

對我個人而言，交卸延安縣長一職後，原以為可以就此一卸重責，不必再過這種每天在刀口上打滾的危險日子。

或許是我命中註定要與共僑打交道吧！我雖交卸了延安縣長，中央却不允許我離開陝北地區，仍要我留在陝北就近瞭解、監看共黨的動靜。

從延安出來，我先到洛川縣負責善後工作，那時政府人員陸續從陷區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區的，就由我在洛川負責善後救濟工作。

在洛川縣兩個月之後，中央派我到清澗縣當縣長，說來可憐，清澗縣也不是個小地方，但是被中共騷擾破壞後，十室九空，原任清澗縣長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，縣政府早被破壞的殘破不堪。

我只好在外租了一個地方，也不辦交接，就開始任事，積極從事著規復工作。在清澗縣待了半年，我又奉調米脂縣當縣長。

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人家，人頭熟、關係好，我在米脂當縣長應該是很輕鬆的。

事實却非如此，因為米脂縣雖未劃歸中共管轄，但正如以往的延安縣一般，政府在米脂縣也只能維持一個縣政府的組織，以表示政府號令仍能通行該地，但實際上該地早已被中共盤踞。

所不同的是，米脂縣畢竟不是延安縣，沒有各級主要共僑在那裡，因此緊張、凝重的程度也就較輕，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頭沉重，行動謹慎。

不過，也有比在延安時情形更為惡劣之處，那就是盤踞米脂縣的那股共僑是賀龍屬下的王震部隊，此人個性極為桀驁不馴，以往與我早有過過節，此刻我們倆再度碰頭，他對我的敵視可想而知。

編造三百多條罪名

我在米脂的工作，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艱困，加上那時中共在「一分抗日、二分應付、七分發展自己」的政策下，力量更形膨脹，當時他們的態度愈來愈蠻橫，滋擾地方的事件無日不有。

我為了地方，不得不經常去找王震洽談事務，其間辛酸、委屈，真是一言難盡。

後來，王震更將我扣起來，打入黑牢，使我再一次成爲共黨的階下囚，與上一次被囚不同的是一點是，這次共黨似乎有意要置我於死地。

因爲他們不但把我打入黑牢，而且還特地從各鄉調來了上千人民，舉行所謂的「羣衆公審大會」。

他們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誣賴我「棄職潛逃」了，這次中共索性誣陷我是「特務頭子」，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條罪名，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那麼「偉大」，居然能造作「三百條滔天大罪」，我是後來自復與基地到香港查閱資料，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「解放報」，以整版二版面刊出公審我的消息，內中強調「特務頭子高仲謙犯下三百條大罪」，才知道原來自己犯了那麼多的罪。中共公審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，公審會由中共中委馮文彬主持，每天一早他們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來，找了一些縣政府職員、民衆來罵我、罵政府、罵國民黨、同時又誣栽種種罪狀，對我百般凌辱。

就這樣，每天晚間我蹲在黑牢中，吃不好、睡不得，白天接受中共日復一日恐怖、威嚇的公審迫害，經過了四十多天，同囚的難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認罪，有的則因此被逼瘋狂。

我既不盲目屈從，也不懼於淫威，邊爾就範，堅忍的挺在那裡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實在受不了，我想：「與其這樣受中共迫害，倒不如跟他們拚了！」

因此，當天押我回黑牢時，我就告訴主持公審的馮文彬，告訴他：

「你們罵我也罵得够多了，現在，我也有話說，明天，我要講話！」

馮文彬一愣，他沒想到每天這種疲勞轟炸、心理壓迫式的公審，不但沒嚇得我心驚膽寒，反而還有膽要「反駁」！

當下他定了定神，就擺出一付偽善的面孔，向我說：

「高縣長，您別動肝火，公審你是『人民』的意思，我們已經在盡力的保護你的安全，讓『人民』不致因過於憤怒而傷害你，如果你要上臺反駁『人民』，萬一『人民』失去控制的衝上臺來傷害你，那怎麼辦？」

這是馮文彬一類共會的損技，他們慣於將責任往「人民」身上推，其實誰不知道，這完全是共黨作的孽！

我當然不怕「人民」真的會來傷害我，因此馮文彬話還沒說完，我就攔住他的話說：

「沒關係，死生由命、富貴在天，我真要被打死了，我也不怨你，但是明天我非講話不可！」

我如此嚴詞正告馮文彬，使他無話可說，只好一疊聲的講：「再說吧！再說吧！」把我又送回了黑牢。

當晚，我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居然睡得更為香甜，絲毫不為第二天所可能面臨的悲慘命運而心憂。

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當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

牢，準備要接受一切考驗時，馮文彬來接我，居然揮了揮手，對我說：

「高縣長，你可以回去，沒事了，一切全是誤會！」

對於這個突來的喜訊，我固然高興，却也知道，這是中共色厲內荏的一貫作風，只要我還是代表中央，只要中共還沒有能力與中央對抗，中共就不敢殺害我。

再度脫離黑牢之後，我仍是不憂不懼，縣城裡已不可能再待下去，我就離開縣城，在武家鎮另外建了一個縣政府，繼續堅守我的職責，因為當時米脂縣城雖然被佔，但四周鄉鎮仍有五、六處未被佔領，我們有責任來保護他們。

在武家鎮待了一年多，我又被調離，接我的是一位吳宜漢縣長，在我走後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殺害，米脂縣也完全淪陷。後來我被調為嵐泉縣長。

在嵐泉縣任內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以嵐泉縣保安隊區區不到一百支破槍的殘破人馬，居然還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軍壓境，使嵐泉縣得以不受共軍荼毒。

這固然是因嵐泉縣本身極為貧瘠，共軍興趣不大，但若非我們縣民個個抱與城共存亡的決心，使共軍望之却步，很可能，嵐泉縣仍免不了要受蹂躪破壞。

我因此曾蒙上級級獎。

私交小節到此為止

民國三十六年，中共叛跡已甚明顯，政府決

定動用大軍收復延安，以懲治中共。

我希望趁著延安的收復，再回到延安去，但是中央認為延安雖收復，四鄉仍未平靖，要我擔任清鄉善後工作，組織民衆、支援國軍作戰，其間艱難危險，幾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，幸好我自己的機智，渡過了這些難關，全力達成了上級交付的任務。

最後，政府推行憲政，我獲故鄉父老支持當選為國民大會汧陽縣代表，離開家鄉赴南京出席國民大會而後再輾轉隨政府播遷來臺，在臺灣地區度過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。

當我獲選國大代表預備自陝西到南京開會前，毛澤東特地託一名說客偽邊區副主席李鼎銘著人來找我。傳話說毛澤東很賞識我，要我不要走，跟著毛澤東絕對有前途。

我怎會聽從毛澤東這些勸降的誘敵甜言蜜語？在陝北一帶與共黨面對面鬥爭有十年以上的經歷，使我太了解毛澤東他們那種嘴裡說的一套、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統戰花招，因此，我絲毫不理會毛澤東的誘騙，毅然告訴來傳話的說客：「從前我當過延安縣的縣長，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，還記得以往那種平起平坐、共同交往的日子，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，我自學生時代起即信仰三民主義，服膺蔣中正委員長領導，以獻身報國自許，今後，我仍是一秉初衷，絕不變節，未來，可能我與毛先生只有敵對的春秋大義，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節，毛先生的建議謝謝了！也不必了！」

就是乘著這個念頭，我始終跟隨著政府的脚

步走，在南京，我是城陷的最後一刻才逃出南京，當我乘坐的火車到達上海時，拿起報紙一看，才知道我們火車一出南京，南京城即陷落，其危險可想而知。

由南京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廣州，最後由廣州到臺灣，這一路上我幾乎皆是前腳剛走，後腳就是共軍衝到，每次在我要隨著政府走時，總是會有一些中共同路人來在我耳邊遊說，要我留下，我皆不予理會。

因為我在離開陝北時即已打定主意，在我當延安縣長、管過毛澤東這一夥共匪之後，我對中共的惡毒心態早已一清二楚，他們人人皆是頭上長瘡、腳底流膿壞透了的人，我這輩子不願意再與這些人有任何瓜葛，今後，我只跟著政府走，天涯海角，我亦無悔！

事實證明，我的抉擇完全正確，轉眼間，四

、五十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，回憶半個世紀以前在延安窯洞內與毛澤東黨徒交手過招的情形，恍如昨日，毛澤東那滿面陰森森的假笑，常常也彷彿在眼前浮動。

血淋淋事實忘不了

這半個世紀來，國家經過驚天動地的大變革，我個人則值得慶幸的，在復興基地還一直能過著安逸、舒適的生活。

但是，回溯在大陸上與中共交手過招的這段日子，再看到目前社會有極少數人居然對政府污蔑、辱罵無所不用其極，不禁令我這個反共的老兵感到憂心忡忡。

中共以往在大陸時，就是用這種「反政府」的方法，將大陸的民心士氣給擊垮，才使得整個大陸因而淪陷。

以我與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人的交手經驗，我知道中共向來是擅長拉一派、打一派，復興基地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以為他們今天「反政府」有功，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賞識。

事情沒那麼好，中共今天聯絡次要敵人將主要敵人擊垮後，明天就會鬥臭、鬥垮次要敵人，大陸上那些「民盟」尾巴黨派的悲慘命運就是最佳實例。

少數偏激份子或許不知道中共的惡毒，竟然主張要與中共「和平共存」、「和平競爭」，我在延安時之所以能「和而不同」，那是因為中共力量還小，我背後又有整個中央的力量作後盾，中共對我當然要假以辭色。

但是當中共力量膨脹後，中共就立刻先將延安等陝北地區併吞，最後更全面叛亂，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訓，我們怎能忘懷？

梅貽琦趣談

原子核為袁子才之弟

民國四十四年，梅貽琦博士奉政府之召，自美回臺，籌備恢復清華大學，擬先辦原子科學研究所。因為日本戰敗導源於美國原子彈兩枚，即解決八年之中日大戰，舉世認為「原子」乃最新科技，一時成爲時髦名詞，市面竟有原子筆、原子燙髮……等流行，梅氏回臺後感覺一般國人好奇，所遇人士多以相詢或請講演，某次梅氏介紹美國歸來一專家作公開講演，講後與聽衆答問，一位年老聽衆提問題：「據說『原子』是總名詞

談

，先生講其中有電子、核子等等，半天我還不明白，能否用最簡單的話說明一下，使人易懂易記？」講者解答了，但問者仍然茫然，再三追問，專家覺得雙方程度懸殊，無法溝通，梅氏以主持人身分解嘲說：「你知道清朝大名士袁子才罷？原子能與原子核，都是他弟弟，這容易記住罷？」聽衆在笑聲中散去。

范大哥拉夫是加速器

民國四十五年冬天，清華梅校長貽琦，從美

· 趙廣颺 ·

國請來青年科學家鄧昌黎博士講學，特別安排在中山堂公開講演，講題與「電子加速器」有關。聽者二千多人，座位不夠，走道門首走廊兩邊都站滿了人，鄧博士講得精采，妙語如珠，許多青年人在散場後仍圍在講臺前請簽名或再發問，一個學生問：「鄧先生提到 Van Graff，效果甚佳，可否請將此名詞，詳加解釋？」因為時已晚，鄧氏另有重要約會，急於離場，梅貽琦代爲解圍說：「那是加速器，由范氏發明製造的，你無妨記着『范大哥拉夫』譯名就好了。」